

## 学林

← (上接7版)

着审讯发落呢(《明史》卷二五九《杨镐传》,6688页)。

在大明和朝鲜最吃紧的辽东战事上,这两个只知贪污索贿的家伙对军国大事全无知,只是凭着自己来自皇帝身边,就自信满满,乱夸海口,觉得撮尔蛮夷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传达的全都是误人误国的信息。面对两个浑人,朝鲜国王也有点儿无奈,只不过他知道天朝信任皮岛的毛文龙,为了报答毛文龙对他的支持便迎合天使,随口说毛文龙“自镇敞境以来,辽民归顺者,不知其数,加以号令严明,威风远及,奴贼不敢近塞,故小邦恃而无恐”(《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238页)。还表示“小邦力弱,岁不能独挡一隅,而与毛帅协心,以为倚角之势,则敢不尽力”(《承政院日记》)。

其实,那个毛文龙岂是可以依靠的人?可国家大事胡乱昏庸,明朝君臣上下大抵如此。皮岛的毛文龙就从这些昏庸的君臣那里,得到诸多好处。朝鲜史料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说王敏政、胡良辅这两个家伙回程路过毛文龙的地盘,毛文龙“盛张军容,皆以锦绣为衣服旌旗,炫耀人目,使诏使巡见”,其实呢?朝鲜人说“其实疲军不炼者也,其败罔天朝类如此”(《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240页)。而毛文龙倚仗大明天朝,对朝鲜居高临下,盘踞在朝鲜海岛上却觉得高朝鲜一等,他们觉得“天朝乃父母之邦,朝鲜为子孙之国”,所以,他们不遵守朝鲜规矩胡作非为,却不许朝鲜官员管束,一旦冲突,就拿出天朝身份说,你这样“是不有天朝,不有老爷也”(《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233页)。

腐败的王朝腐败的官,昏庸的天使蛮横的兵。有这么一堆腐败而昏庸的人,大明王朝真是没有办法回天。仅仅过了两年,后金大军攻破朝鲜,国王李倬逃到江华岛,签订了城下之盟。也是在那一年,明熹宗去世,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即位,魏忠贤被捕,随即自杀,王敏政和胡良辅也失势被贬。下一年,改元崇禎,大明王朝也终于走到尽头。

4

回到天启五年的朝鲜。

在京城折腾的天使,把朝鲜搞得天翻地覆。十万火急地,他们催要银子,催要虎豹

皮,催要海狗肾,催要人参,弄得朝鲜官方百般无奈,就只能向民间搜刮,民间一旦交不出来,就只好抓人,搞得“囚系满狱,怨呼彻天”。就连负责督办礼品的朝鲜大臣全混也忍不下去,向朝鲜国王李倬痛诉,“天使求请之物,臣竭力求贸,启下单子数外,加给者甚多,而犹不满其欲,恐吓不已。其中,海狗肾、海獭皮则加严督,市人等以为,‘一死之外,更无觅得之路’……”。他们觉得,即使“倾国之力,而无以尽充其欲”(《承政院日记》277页,283页)。

应付再应付,总算熬到了六月戊子,天使终于要走了。走之前,他们居然把迎宾馆的“铺陈器具”全部打包带走,而且在欢送宴会和仪式上还向朝鲜索要“花马,体大而便于骑者”。这还没有完,在回中国的一路上,凡是碰上没有桥的河流,他们就借口无桥索要贿赂,朝鲜史料记载说,“托以无桥,必折银以捧,名之曰‘无桥价’。所经州县,一时荡然”(《中国史料》3239页)。

\* \* \*

这是一个发生在天启五年东亚朝贡圈中的故事,它让我们重新思考所谓“朝贡体制”。说起来,政治意义上的“朝贡圈”并不等于经济意义上的“贸易圈”。天朝有时候确实“厚往薄来”,为了撑住面子乱撒银子,但有时候也会居高临下,不免也向附属国敲诈勒索。特别是前面提到的那种“天朝乃父母之邦,朝鲜为子孙之国”的傲慢和自负,往往使得天朝外派的使臣有了飞扬跋扈、贪污腐败和敲诈勒索的借口。费正清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说,朝贡体系是中国把处理内部事务的规则和习惯推广到国际事务,尽管现在批评费正清有关朝贡体系论述的人很多,但这话并没有错。朝贡体制是有中心、有等级的,有的中国使臣不光把内部的等级差异投射到外部的世界秩序,也把在国内官场那种上下相欺、层层盘剥的习惯,惯性地推广到国际交往的舞台,使得这种表面看上去以礼仪制度建构起来的朝贡体系,也变得像一个等级制度建造出来的腐败官场,最终各自离心离德,不得不在外力冲击之下轰然倒塌。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

# 1910年,日本如何吞并朝鲜半岛

文/唐纳德·基恩 译/伍秋玉

对于占领一个和自己一样有着古老传统的国家,日本似乎没有丝毫怀疑这一行为的正当性。对于韩国抗拒日本送来的现代文明的大礼,日本政府感到很不解,只能将此视为无知。当时,鲜有日本人意识到了殖民主义是一种毒药,它所毒害的不仅是被殖民者,也毒害了殖民者。

1910年8月22日,日本和韩国签订协约,正式宣告吞并韩国。十个月前伊藤博文遇刺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韩国人刺杀最受尊敬的日本政治家,无疑加深了日本国内已经存在的一种认识:韩国人目无法纪,无法自治。此外,如果伊藤没有被暗杀,他也许会制止日韩合并的主张,尽管日韩合并的决定早在一年前就已经被提出来,尽管日本政府只是在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机会来实施这一计划。

日本以维护韩国独立为借口打了两场仗。但是,较之大多数日本人不感兴趣的韩国独立,日本更在乎的是要阻止清朝和俄国干涉其开发韩国资源的计划。一些韩国人(如安重根)将天皇在向中国和俄国发布的宣战诏书中声称的战争目标,视为维护韩国独立。比安重根更受到日本感化的个别韩国人,开始公开拥护日韩合并。

1904年,在日俄战争期间为日本人担任翻译的宋秉峻成立了一个致力于与日本合作的团体——一进会。这个新成立的团体吸纳了与东学党有关联的李容九,并与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头山满、杉山茂丸和内田良平这些臭名昭著的黑龙会的创始人)合作(桀渊信雄,《日韩交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74页。另请参阅森山茂德,《日韩併合》第128—129页)。1906年10月,统监府兼职雇员内田成为了一进会的顾问,此后便开始担任伊藤博文和韩国亲日派的中间人。1906年底,伊藤决定利用一进会,于是从次年1月起,统监府每月向该团体提供大约两千日元的资助金(森山茂德,《日韩併合》,第129页)。

在统监府设置后成立的第一届韩国内阁由朴齐纯担任领导。虽然受过良好教育的朴齐纯支持伊藤提出的改革,并且和伊藤相处融洽,但在得知自己成为了反日活动的主要目标

后,他情绪低落。此外,“义军”的反抗活动日益增加。尽管伊藤请求朴齐纯留任,但他仍坚持辞职。伊藤不得不在1907年5月组建了一个新内阁,推选李完用[李完用的职业生涯充满波折。1896年,他是亲俄派领导人中的一员,力劝国王高宗到俄国公使馆避难。那一年稍晚时候,他被推选为独立协会副会长。独立协会是一个亲俄组织,反对外国干涉朝鲜事务。1905年,他担任学部大臣,是“乙巳五贼”中第一个签署《乙巳条约》(该条约规定将韩国的外交权让给日本)的人。1906年,高宗拒绝与新政府进行更加积极的合作,他极其生气,建议日本废黜皇帝(森山茂德,《日韩併合》,第125页)。此举使得李完用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当伊藤于1907年成立新的内阁时,李完用被推选为总理大臣]担任总理大臣,推举宋秉峻担任农商工部大臣。

伊藤向新内阁发表的“鼓舞士气的讲话”包含以下内容:

如今日之发展,夫韩国之灭亡非因他国,在于韩国自身也……余助诸君,尽力得韩国之自立,然韩人……尚未觉醒……为获韩国之存在,最迫切紧要方针在于与日本诚实亲睦,决心与日本共存。[森山茂德,《日韩併合》,第130页]

这些话表明伊藤确信与日本合作对于韩国日后的繁荣而言必不可少,但他并不建议立刻合并两国。不过,他含蓄地警告说,如果对于他为韩国人所做的一切,韩国人未能心怀感激,那么他可能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

“义兵”在朝鲜半岛各个地方发起的反日活动明确表明全体韩国民众都痛恨日本统治韩国。不过也有一些韩国人认可伊藤的改革,认为与日本合作能给韩国带来实质性好处。

李完用的内阁成员都是坚定的亲日派,但他们之间也有分歧。比如说,李完用仇视一进会。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是贵族,而一进会是由出身卑微的人领导。然而,伊藤主要关心的

问题似乎不是韩国人之间的争吵或反日活动,而是俄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1906年,当俄国向汉城任命新的总领事时,理应按照《乙巳条约》(该条约规定由日本管理韩国的外交事务)向日本外务省递交国书。但是,他们却把它交给了韩国皇帝,表明仍然视韩国为独立国家(同上,第131页)。伊藤担心,这可能意味着俄国并没有放弃干涉韩国的野心。实际上,伊藤踏上了前往哈尔滨的黄泉路,大概也是希望能够改善与俄国的关系。

宋秉峻公开拥护日本吞并韩国,认为与不彻底的被保护国状态相比,合邦可能是一项更加成功的治理韩国的政策(Woonsang Choi, *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70)。1906年11月,得知伊藤小心翼翼地观望当前局势的发展,而不愿立即采取行动逼迫韩国皇帝退位,他感到很沮丧(森山茂德,《日韩併合》,第129页)。内田良平认为伊藤无意吞并韩国,于是于1908年加入到了进一会要求日本政府罢黜伊藤的倡议之中。1909年,宋秉峻辞去内阁职务前往日本,力劝总理大臣桂太郎抓紧时间吞并韩国(桀渊信雄,《日韩交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74页)。伊藤担心宋秉峻的辞职可能会导致韩国内阁垮台,于是升任宋秉峻为内部大臣。

总之,在日本作为韩国保护国的三年半中,伊藤对没能赢得韩国民众的拥护感到失望,决定辞职。显而易见,他的渐进政策失败了。“义兵”的反抗活动日益加剧,加上日本政客的攻击愈演愈烈(这些政客声称伊藤的怀柔政策削弱了日本的威望),使他觉得没有必要继续在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职位上浪费时间。然而,即使在1909年6月辞去统监一职后,他对日本政府仍具有重要的影响

(下转9版) →